

● 中国历史

# 简论周公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的影响

商 国 君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陕西 西安 710062)

[作者简介] 商国君(1954-),男,吉林双辽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摘要] 周公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先哲,其思想确有独到之处,概要言之,即是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思想;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创造思想;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一统天下、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公而忘私、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这些思想不但在殷周社会转型之际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周公思想;先秦儒家;影响

[中图分类号] K8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1-0015-05

周公是中国古代的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如从有确切而系统文献记载角度看,可谓无愧是第一人。作为一位思想上的先觉者和政治上的实践者,他既为周一代革故鼎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sup>[1]</sup>(第 16 页)。他不但具有卓越深邃的思想方面的真知灼见,而且能将其贯彻实施于政治实践之中,形成可以操作的相关制度。他的思想来源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在实践中的理论升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付诸于政治实践。他的思想及具体政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先秦儒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并通过儒家的传播与履践,使之绵延不绝而至当今。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在前贤研讨的已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思想内容的精髓,并进而简要论及其思想对于先秦儒家的影响<sup>[2]</sup>(第 37 页)。不妥之处,敬祈师长同仁予以斧正。

## 一、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思想

周作为商在西部的一个属国,欲取而代之主宰天下的志向,文王时即已形成,经文王、武王父子两代多年苦心经营,终以“小邦周”而一举灭掉“大邑商”,成为天下的主宰。商的灭亡,与纣及上层统治者倒行逆施、暴虐万民密切相关,从而失却民心所向,致使其最终失去统治的根基;上层统治者内部分崩离析,纣也成为孤家寡人。然而,纣至死仍不悟,还在侈谈“我生不有命在天?”<sup>[3]</sup>《尚书·西伯勤黎》)依旧深信其“上帝”,并对“上帝”隐约表现出怨恨。与纣截然相反,周公在事文王、辅武王灭商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感知“上帝”对社会兴亡治乱是鞭长莫及的,民众及其人心向背,才是社会兴亡治乱的关键所在。没有民众的鼎力支持,“小邦周”生存都无法持续,更不可能一举灭掉“大邑商”。面对着社会的剧变,周公在思想意识形态理论方面,针对社会实际需求,进行了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从而使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宝

库中又增添了一份财富。

周公顺天应时、适时兴替的变革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天命无常。商代是神权笼罩一切领域,但其骨子里仍是假借“上帝”旨意而行“王令”,目的是狐假虎威,镇慑民众及持不同意见者,久而不思辩其真伪,商人尤其是上层统治者,逐渐对“上帝”深信不疑。关于此点,《诗经·绵》及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辞可以证明。周已灭商,周公深知民心向背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但针对商人宗教信仰及心态,以及用少数周人统御众多商人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为周在统治上创造理论依据,于是周公适宜提出“唯命不予常”<sup>[31]</sup>《尚书·康诰》)的思想,亦即是“天命无常”。他有机地将“上帝”和“天”结合为一体,以“天”取代包容商之“上帝”,完成了思想理论上的转移。既然“天命无常”,那么“天命”转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周公对商“上帝”观念地修正及补充,较为合情理地解决了周代商的权力转移,并使“天”成为周的保护神,也在宗教信仰及心态认知上,使商人予以一定程度的首肯。“唯命于不常”,在周初已形成一种思想意识,《诗经·文王》则明确言“天命靡常”。《诗经·大明》则进一步言“天难忱斯,不易维王”。由是可知,天命无常的思想认识,其更重要的价值是在于究竟怎样才能永保“天命”而不失之,也就是如何才能使周的统治得以长治久安。因此,周公又提出了与之适宜组合的系统思想理论。2. 敬天保民。“敬天”既是继承修正商人思想信仰,也为周人统治提供思想理论依据,同时,也含有一定意义上的自我约诫。因为商纣王等人违背天命,因而“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sup>[31]</sup>《尚书·康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sup>[31]</sup>《尚书·召诰》)。周公在对商遗民的解释过程中,虽一再强调周代商实乃“天命”,但他确信此“天命”就是民心民力,故而在“敬天”的同时,极力大倡“保民”。因为只有实现“保民”,才能使“天命”不移。周公深刻意识到这绝非易事,所以他曾一再告诫康叔:“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sup>[31]</sup>《尚书·康诰》)而要达到真正永久“保民”目的,必须在治国治民策略上进行变易,以免重蹈商亡之覆辙。3. 明德慎罚。“明德”即是要求治国者首先加强自我克制,处身行事以“德”为规范,同时也要加强对“民”的思想教育。周公已意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sup>[31]</sup>《尚书·蔡仲之命》)。“明德”除施政者加强自身修为外,还要在对待“民”中体现出来,一定要效法“古先哲王,用康保民”<sup>[31]</sup>《尚书·康诰》)。概括言之,即要在一定程度上施惠于民。“慎罚”思想,集中体现在《尚书·康诰》中,主要是周公在借鉴商残刑酷法教训的反思及在新形势下执法的思想原则,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周公的变革思想,归结起来,是顺天应时、适时兴替的产物,它在摆脱神学、重视民众及民事现实上,开启了思想认识的先河。它对先秦儒家的影响是深刻的,使其“天命观”、“天人观”又向前跨进一步,虽未能完全超越历史认识局限,但毕竟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崇尚人事、注重现实,进而形成系统的“德治”思想;重人重民思想也更加透彻明晰,形成“轻徭薄赋”而“保民”的传统思想。

## 二、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创造思想

历史上的事非成败,永远可资借鉴。周公在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思想及实践上,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典范,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印证。

1. 加强完善宗法制。“禅让制”被“世袭制”或曰“传子制”所替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由血缘为基础而形成的氏族制,逐渐发展形成宗法制。夏、商时期宗法制缓慢发展,但人为利用自然血缘为政治服务的趋势明显增强,然而,至商灭亡,仍未能形成强制性的制度,这可从夏、商王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得以证实。恰恰因为这一问题未能形成硬性制度,故此为夏、商王位继承及最高阶层权力的移交接替埋下隐患,导致“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sup>[41]</sup>《史记·殷本纪》),从而引发统治集团上层内讧,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有鉴于此,周公利用自然血缘关系,将之人为加强改造与完善,创立了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以“尊尊”、“亲亲”为原则的宗法制,从而解决了由上至下、由政治权力及经济占有的层层法定继承关系,并进而明确“亲亲”必须为“尊尊”服务,并再以此为基础前提,再进行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

2. 分封建国。这是周公以宗法制为基准原则,以血缘的远近亲疏为量度思想在治国策略中的具体实施。被分封到各地建国(地方政权)者当然不仅限于同宗,也包含部分与周王有姻亲关系的人,部分灭商建周异姓功臣以及古代“帝王”后嗣、亡国之君王的后嗣等,但无疑是以同宗同姓为主要对象<sup>[5]</sup>《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通过分封建国,完成了政治利益的再分配,同时也完善了地方政权的建设,巩固了周王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

3. 完善井田制。这是周公经济思想的具体实施。《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由引可知,周公确对夏、商之井田制有所继承及改革,并使之成为周代的经济基础。经过对井田制的改革完善,更加强了周代中央及地方的经济实力,在一定限度内也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些思想的形成与由此进一步完善的相应制度的实施,使西周在商代社会基础上,又越上了一个发展的新台阶,收到了预期的功效,它也对先秦儒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概要言之,先秦儒家的仁学文化,是以宗法之根基“孝”为出发点而形成的;政治利益的分配虽重“德行”,但更优先于“有德”的同姓同宗;至于孟子“制民之产”思想的形成,更直接的受到“井田制”理论的影响。

### 三、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

作为一个思想家及政治家,必须具有远大目标,清醒头脑,深谋远虑并能防患于未然,不可为一时胜利及成就冲昏头脑,一定要面对客观实际,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并要虑及长远,未雨先绸缪。周公在丰富政治实践的感性认识上,逐渐形成了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具体从下列 5 件事例可以资证。

1. 安抚商遗民。周公辅佐武王灭商后,立即与武王共谋如何安抚商遗民,以期争取商遗民的支持并消弭其可能复辟。首先,本着“灭国不灭嗣”的古老传统,封纣王子禄父(武庚)于商王畿一隅,使其延续商之余祚。其次,对忠诚于商而以周为敌患,终又被商纣王杀害,迫害的人予以礼待,即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释箕子之囚、礼遇微子启<sup>[4]</sup>《史记·周本纪》)。这些措施对稳定及争取上层商遗民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次为“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sup>[4]</sup>《史记·周本纪》)。此举为争取下层商遗民之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2. 设三监。为防止武庚的可能复辟,周公与武王决定将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王畿之内,以就近监督武庚及分别治辖王畿的商遗民,防武庚及商遗民的反叛于未然。此举初期收到了预想目的,后因周公“摄政”而促发管、蔡等人联合武庚的大叛乱,但周公的初衷仍体现了其深谋远虑。

3. 建洛邑。周原来偏居西部,灭商后,遇到如何管辖及监控商原属的广大东部地区的新问题。武王及周公等人为解决此问题,拟在原周、商结合部兴建洛邑。尚未及实施,武王崩。因成王年少,故周公“摄政”,却又引发管、蔡联合武庚叛乱,又连锁引发商原属地区的相继叛周,迫使“周公东征”。平定叛乱之后,周公继而实施兴建洛邑计划。洛邑建成后,成为监控东方地区及其后封国的桥头堡,为周中央政权的巩固发挥了应有的功效。

4. 迁“殷顽民”于洛邑。为防止商遗民叛乱,周公在分封建国时曾将之化整为零,分别分封给继武庚之后所封宋、鲁、卫二国也分封赐与一部分商遗民<sup>[5]</sup>《左传·定公四年》),剩余者多为具有较强反周思想的“多士”,即所谓“殷顽民”。为防止其可能反叛,均将之迁往洛邑,就近监控,但仍对其予以相对宽松优惠的待遇,使之“宅尔邑,继而居”<sup>[3]</sup>《尚书·多士》),此举有效地扼止了商遗民可能爆发的反叛。以上四点,侧重于防止商人的复辟和反叛,将其分层采用不同举措加以解决,这仅是针对被征服者的实情及其可能发展趋势的防患认识及相宜处置。更为可贵的是,周公还能够借重“殷鉴”遗训,从“守业”角度虑及长远,力诫成王,修德正身,勤勉政事,勿耽于康乐田猎,否则,就会使商亡国悲剧重演<sup>[3]</sup>《尚书·无逸》)。

周公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及相应举措的实施,对周初政权的稳固及其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并对先秦儒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誉其大者,如忧患意识的形成,则可溯

源于周公思想。先秦儒家将之转化为深沉的忧患意识,并由此而转化为一种社会感、使命感、责任感,进而形成持续不断的理论观念的更新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实践,以期使当时社会由“无道”向“有道”的转变。再经儒家的持续努力,忧患意识已被历代“有志者”所认同,“居安思危”今日仍有认同价值。

#### 四、一统天下、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

周公在灭商、平乱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又经一番深思熟虑、治乱抽丝地审慎抉择,逐渐形成一套如何在一统天下后,使之能达到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进而形成治国的指导原则和具体可行的制度<sup>[6]</sup>(第 98 页)。有关周公的管理思想,可从下列礼制的颁布施行中予以证实。

1. 制礼作乐。《尚书大传》载言,周公“六年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也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公所制礼乐,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原则及相关制度。其指导原则是在严格等级制的前提下,按“尊尊”和“亲亲”关系,确定尊卑贵贱、远近亲疏,实现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并由此而形成一统天下后的运作及管理模式,使之由上至下、由内到外、从个人内在道德认同到外在具体行为规范践履,皆纳入井然有序的轨道之中。

2. 层层隶属,职责分明。在“分封建国”、“以屏藩周”的明确目的前提下,分封了众多侯国,完成了地方一级政权的建设;再由侯国以下逐次赐封,逐渐形成二级政权及基层政权的建设,最终形成以王室为中枢、以侯国为骨干、以基层为基础的政治管理体制,达到天下一统而又井然有序。为使之权责职分更加明确,又辅之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此外又明确规定了各封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及其所享有的职分特权,如对侯国大小的军制予以严格限定等。周公这些思想及其由此而形成实施的相关制度,促使周代国家形态比商代又前进了一大步,诚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言:“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因而才有周人在《诗经·北山》中的豪迈宣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周公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呕心沥血的筹谋下,井然有序管理才得以实现,使西周成为我国古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

周公一统天下、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及其良好功效,对先秦儒家影响至深。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把周公经营下的西周盛世作为政治上追求的目标之一。孔子在周公管理思想的影响下,大力倡导天下一统,此可以《春秋》为证。他还对周公所制之礼,予以部分改造和发展,极言和谐有序的重要性,主张人人都应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各尽其力,从而达到“天下大治”。

#### 五、公而忘私、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

利欲熏心、惟利是图、以私害公之人,古今都是遭人憎恶的;理论巨人、行动矮子、光说不做的人,终究会被淘汰。公而忘私、口心如一、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人,无论古今,都会得到人们的敬爱。周公深谙个中道理,一生谨慎修为,勉力而行,因而得到古今人们由衷的敬爱。之所以如此,是与其公而忘私的高洁人格和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密不可分的。从以下具体事例中,我们可略窥端倪。

1. 注意修德行事。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由此可知其非常注意伦理道德修为,不但在内心予以认同“孝”、“仁”,并努力按之践履行事,这对其以后逐渐形成高洁人格与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2. 公而忘私,力挽狂澜。据《尚书·金縢》等记载,武王伐纣后一度病重,周公曾召人设坛卜祝,愿以身代武王没,以便让武王完成天下统一大业。未几,武王崩,成王立。成王幼,无法治政,而天下又百事待举。在此危难时刻,周公依据传统王位继承原则,冒着被误解的风险,置个人利益于度外,挺身而出,“摄政”行王事,使周初度过了上层权力更迭难关。管叔、蔡叔等不满周公独掌朝政,勾结武庚发动叛乱,于是连锁引发商原属区域的反叛。一时间,新建的西周政权顿时处于风雨飘摇的险境。对管、蔡是否一同镇

压,意见不一。周公在此危急关头,力排众异,公而忘私,以国家、阶级的总体利益为重,统一上层思想认识,安顿“宗周”后方,毅然率兵东征,历时三年,平叛成功,使周初政权重新得以巩固,并逐渐得以发展完善。

3. 致政成王,功成身退。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七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初各项制度的设计创立大多出自周公,如何身体力行、率身垂范,周公深知其重要性。嫡长子继承制攸关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及平衡,是各项具体制度的重中之重,因而,周公在天下经营大定之后,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致政于成王,自己功成身退,安居臣位。这种身体力行的表率精神与行为,的确令人发自由衷的钦佩。

周公的这种思想及行为,对先秦儒家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身体力行的同时,又大力加以宣扬倡导,对表率精神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认为“执政”者的表率精神作用,更具有重要而广泛的意义。他们都极力强调,“为政”者无论在道德修养,还是在其他诸方面,都要为他人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如“正人”先要“正己”,以“身教”辅以“言教”,甚至认为“身正”可以收到“不令而行”的功效。

以上从 5 个方面简要论及的周公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的影响,从中可见二者具有直接承继发展的渊源关系。这些思想精华,形成于周公,阐扬于先秦儒家,尔后则渐入民心,绵延影响至今未绝。其精华所在,只要予以适宜转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定会有所裨益的。

### 参 考 文 献

- [1] 商国君. 略论周公对历史的贡献 [J]. 松辽学刊, 1992, (2).
- [2] 商国君. 先秦儒家仁学文化研究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 [3] 尚书 [A]. 阮元. 十三经注疏: 上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 司马迁. 史记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 [5] 左传 [A]. 阮元. 十三经注疏: 下册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 商国君. 略论周公制礼及礼制的指导原则 [J]. 求是学刊, 1993, (2).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 Brief Discussion on ZHOU Gong's Thought & Its Influence to Confucianism in Pre-Qin Period

SHANG Guo-j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Biography** SHANG Guo-jun (1954-),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ncient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bstract** ZHOU Gong's thought: The changing thoughts to conform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time; the creating thoughts to draw lessons from history and weed through the old to bring forth the new; the suffering thoughts to think deeply and plan carefully, provide against possible trouble; the managing thoughts to have the situation under control in perfect order; the model thoughts of selfless, to practise what one advocates earnestly.

**Key words** ZHOU Gong's thought; Confucianism of Pre-Qin; influence